

魯認《錦溪日記》裏記載的閩文化*

— 以學術思想、書院文化以及科舉制度爲中心 —

박 영 환**

<目次>

- | | |
|---------------|---------------|
| I. 序論 | IV. 科舉文化與社會制度 |
| II. 武夷書院與講學大會 | V. 結論 |
| III. 閩地學術思想 | |

I. 序論

魯認(1566~1622), 字公讖, 號錦溪。朝鮮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出生於全羅道羅州荷衣里。宣祖十五年(1582)進士及第, 同十八年爲冰庫別提。一五九二年朝鮮發生壬辰倭亂, 魯認受父親之命, 以都元帥權慄參畫, 屢立奇功。一五九七年六月在全羅道南源戰鬥中魯認被俘獲, 押送到日本, 之後他在島津義弘治下的薩摩州度過十八個月的俘虜生活。後在中國福建官員林震虢等人的協助下, 一五九九年三月十七日魯認潛身逃海, 十一日後到達福建涪縣。又經過漳州、興化, 到福州, 在福州生活了三個多月後, 再經杭州、山東到北京, 一五九九年十二月回到朝鮮。當時魯認堅持每天寫日記, 取名爲《錦溪日記》。現存《錦溪日記》通過問答形式, 記錄了從一五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七日的福建省風俗情況。雖然只有百餘天的記錄, 但是它的內容

* 위 논문은 2012년 4월 28일 대만국립성공대학교에서 주최한 “2012年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에서 발표한 내용을 수정 보완한 것임을 밝힌다.

** 동국대학교(서울캠퍼스) 문과대학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豐瞻。在本文中，通過詳細描寫兩賢祠(武夷)書院以及講學大會、明朝秀才關於科舉制度、社會制度方面的談話等資料，主要探討當時閩文化中的朱子學思想，以及閩地書院文化發展的情況。

II. 武夷書院與講學大會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十七日，在中國差官林震虬等人的幫助之下，魯認逃脫了十八個月的日本幽囚生活，同月二十八日到達漳州浯縣¹⁾。四月三日的日記裏對漳州城的描寫非常生動，從他的記錄來看，當時漳州城繁華程度令人驚訝。漳州依海臨山，是僅次於泉州的貿易港口，魯認筆下的漳州，充滿了生氣，商機盈然。秀麗風光漳州城，文化底蘊深厚，市場極為繁華，房屋毗連。從四月七日的日記中，了解泉州城的繁華：“一路奇觀，則非徒城市繁華。自漳州至此千餘里路，皆以熟石鋪于大路。蓋中華物力，舉此可見矣。且道傍左右，長廊客店樓觀櫛比，□□□□水野之外，長廊少無斷絕。而行人則磨肩擊轂，稠密如雲，急走差官及凡騎驢馱馬者，不可以口盡辭，人必佩鳴鈴辟之。”四月九日中午，魯認一行到達福州府。泉州府與漳州府如此發達，府都福州的繁榮程度當然更不用說。他們剛進入福建省軍門街前，映入眼簾的就是“滿城繁華衣冠文物之盛，口不能形容矣”²⁾景色。四月十一日，魯認等四人到福建軍門，拜謁于軍門大司馬，呈上倭情及萬里之行的始末，表達要求前往京城，早日回家的願望。大司馬熱情地答應將立刻上奏天朝護送之，然後安排住宿。

魯認在四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唯一記載了參觀福州城的遊記。當時魯

1) 魯認被調查時，他大約說明了到達中國的來龍去脈：“弊邦雖鷓鴣草木，皆被倭禍。況我則丁酉秋，父母兄弟子姪妻孥並二十餘，皆陷賊鋒。而認獨幸免，未得共死於一時，擄入賊土，探察情勢，則秀吉雖死，餘賊憤恥，狼心不悛。不可以姑退，永謂之廓清。擬哭秦庭，治彼吳宮，故潛把愷悌君子林先生之船，苦渡萬萬里鯨波矣。”(《錦溪日記》三月二十八日)

2) 《錦溪日記》四月九日。日記裏有“□”，表示著在原文上看不到的字。

認等四位朝鮮人與衙客二人一起參觀福州城。他們查看了古跡、寺廟、兵營以及江山等地理環境，包括當地特產品、奇寶，貿易情況等在內，魯認對此有過非常生動的描寫。魯認在五月二日的日記裏面，還描繪端午時節福州城及湖池周圍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和優美的自然風光³⁾。

五月十日，魯認到軍門，進呈文，布政以下官員，皆見而嘆之。當時有右布政徐卽登爲見羅先生李材的門人⁴⁾，被稱爲當代第一道學者。徐布政閱讀魯認呈文，情甚憐惻。徐布政認爲，由於夏季長程雨水方漲，護送不便，因此以待清秋日氣清涼，霖雨快霽然後送走。至五月十一日，徐布政司派家丁，送來《閩中答問》八卷、銀子二兩。因此，魯認又寫了一篇致謝呈文。五月十二日，朝食後，率奇孝淳等三人，前往布政衙門⁵⁾，准魯認移住兩賢祠書院。其文曰：

俄而，兩布政乘八人轎，比接二轎，徐徐出門。秀才輩先呈手本，我亦隨後呈文。則徐爺曰：“欲拜監察御史，進去那衙門。爾當待吾之回再來，則可得從容。”我即唯唯而退，仍隨其後，擁門子之肩視之。則徐爺開帖視咏曰：“做得妙麼。”再詠後，送于左布政朱爺，（姓朱名運昌，乃浙江人也。）則朱爺看畢亦曰：“做得妙麼。”徐爺再看而叫門子分付曰：“朝鮮官爾即帶去兩賢祠書院，兩賢乃□□松□□□使諸秀才接待，留館參講云云。”門子分付而退。

徐布政再次看到魯認的呈文，嘉嘆之餘而將他安排住兩賢祠，參講留館。從此開始，到魯認離開福建之前，他一直住于所謂的“兩賢祠書院”，也就是“武

3) 詳細的內容參見於《2011成功大學閩南文化會議論文集(二)》23頁。

4) 在《海行摠載》收錄的《錦溪日記》裏將李材誤記爲李村。《海行摠載·錦溪日記》，民族文化追進會，79頁。

5) “則左右布政，欲拜監察□，御史而門已洞開。健步三十餘雙，鱗次出門。行次威儀。已啓正路，而秀才二人，戴生巾穿青衿，（生巾。乃生員監巾。乃大明太祖所製。）立于大門外路傍，欲呈手本。（手本各衙呈文，通稱曰手本云云。而各省各衙狀啓，則通稱曰奏本。）我亦欲呈做文，進着于秀才邊。則秀才輩，厭吾之着，移立於五六步許。我知他避吾之狀，又隨而進，則他又避再移。想彼秀才輩，非是以我謂他國人而避之，蓋自負青衿之異於凡人，故必避再移矣。”（五月十二日）

夷書院”。由於朱松與朱熹奉祀于武夷書院，故叫“兩賢祠書院”⁶⁾。這對魯認來說，無意間提供了與當地士大夫交流，并了解當地學風的難得機會。在“五月十二日日記”裏魯認描寫有他剛到武夷書院時的情景：

引我帶去兩賢祠，則有祠巍然。門牆嚴邃而大門之頂，題額三字曰，兩賢祠，入門則誦聲洋洋。門子先入，以徐爺分付，傳于主講秀才曰，如是如是。既而年少秀才，出來揖我，而相讓引入。則中有講堂大開，而題其額曰明道堂。(乃李先生見羅之手筆也。)堂之軒東，掛鍾而刻其背曰，杏壇遺鍾。軒西掛磬而(磬狀廣如□□而以鋼鐵鑄成)刻其面曰，泗濱浮磬。皆以朱紅，潤色字畫。蓋堂之前後左右各有文房，而穿青衿戴生巾秀才，各自房中而出。讓我於東壁，而秀才輩列立於西壁，相揖然後，置卓子於中堂，而列椅於卓子四邊，請我於北壁尊客之坐。我極辭曰：“東西賓主之正位，南北君臣之極分。僉賢游聖門下，居首善地，何末俗之曲禮也。”秀才曰：“遠客遠客，自然當坐。”舉袖固讓，我不得已坐。則秀才中長者，坐于南椅之正中，而其餘各以年齒，環坐四邊。(五月十二日)

從這些記錄，可知當時武夷書院的建築結構：先有兩賢祠門，中間有講堂叫曰“明道堂”。堂之東邊，掛鍾而刻其背有“杏壇遺鍾”；堂之西邊，掛磬而刻其面有“泗濱浮磬”，其字皆以朱紅，潤色字畫。蓋堂之前後左右各有秀才的文房。此外，“明道堂”的後邊有別間，叫“新德齋”⁷⁾。又書院的最後邊有祠堂，將朱熹之父親朱松與朱熹奉祀于祠堂。《錦溪先生文集》裏附有“武夷書院之圖”邊有說明：“武夷山在閩中福建崇安縣，南二十里許，周回百餘里茅五曲，

- 6) 有些人誤認為將程子與朱子奉祀于武夷書院，故叫“兩賢祠書院”。其實這是錯誤的。《錦溪先生文集》(景仁文化社，一九九七年七月)九十二頁裏的“兩賢”下面有注云：“韋齋、晦菴”。“韋齋”為朱熹之父親朱松的號。又在《錦溪先生文集》(景仁文化社)一六八頁裏有魯認親自畫的武夷書院圖案。圖案的最上頭畫有祠堂。上寫著“韋齋朱先生、晦菴朱先生”。朱松(1097~1143)，字喬年，號韋齋，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朱熹之父。宋紹聖四年生於徽州婺源，宋紹興十三年卒于建州城南環溪，葬于崇安五夫里。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同上舍出身，寶和五年(1123年)，詮試迪功郎，授政和縣尉。
- 7) 五月二十七日：“明道堂後別間新德齋，黃秀才大晉、王秀才繼臯二人，正榻開卷。左右圖書，牙籤滿架，而家語共三十五卷。”

有朱子書院，而大門之頂題額曰：‘兩賢祠’中有講堂題額曰：‘明道堂’……”⁸⁾

書院諸秀才對魯認持有非常尊重的態度，在大堂上魯認認識了倪士和(字德美，迎丰府人)、謝兆申(字伯元，建寧府人)、陳儀(福州府人)等二十九名秀才。魯認亦記載了書院院規。比如五月十三日日記：“每朝諸會，參謁徐宗師像，而分東西壁參揖然後，各退房中，以做課業。”此外，每個月初一與十五日，書院舉行兩次較大型的上課活動。如“六月十五日”的紀錄：

諸秀才早起整衣冠，皆會明道堂。高掛徐宗師影像於北壁之下，各以年齒，北向列立，參揖宗師影像。而又左右相揖然後，各坐于長板椅。而年少秀才二人，出立中堂，唱歌詞三次。又通讀《心經》第二卷‘牛山之木常美’而欲罷。喫沙糖餅三介，啜茗三口而後罷。蓋此講，每月朔望，恒留秀才外，雖出入之士從事於宗師門下者，亦皆會。而且以井間書冊，別書參講人姓名。又各着署，以考參講勤慢也。

明道堂集合，參揖宗師影像，又向左右互相相揖後就坐。年少秀才二人，出立中堂，唱歌詞三次，又通讀《心經》第二卷。最後吃沙糖餅三個，喝三杯茶而後結束。這些參講活動有初一和十五日兩次。參加的秀才，除了住在書院的秀才之外，還有從事於宗師門下者。有趣的是備了出席符，讓自己簽名，以此了解參講的成績。

魯認在布政司徐卽登的安排下，從五月十二日開始入住于兩賢祠書院(武夷書院)。當時他除了參加書院參講、與諸位秀才討論風教、禮制、科舉制度之外，他還直接參加了一次講學大會。如在五月二十五日，布政司徐卽登爲了行人司李汝珪主辦了講學大會。在徐卽登的親自參與之下，大會前一天開始舉行彩排練習，可見他們重視的程度，比如：

食後，諸秀才四十餘雲集聚會。我問之曰：“何樣秀才，如是聚會也。”倪秀才書示曰：“明日，宗師爲行人司李汝奎，大會講學。故芝峯、謹江、三山諸書院秀才皆會，足下得見天下盛禮矣，不亦樂乎。”俄而，徐宗師到祠云。諸秀

8) 魯認, 《錦溪先生文集》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景仁文化社, 168頁。

才皆出門外祇迎，我亦隨秀才而迎來。則徐宗師舒禮于兩賢祠宇後，次陸明道堂，高拱端立于堂邊。諸生列立階上，皆三揖以後，宗師坐椅於中堂。諸生亦以年齒列坐左右，而秀才一人，詣樽所奉茶，親獻三次以後，歌詞鍾磬諸等節次，一一儀而罷。宗師將出，諸生亦以次皆先出門外祇送。蓋祇迎祇送之禮，中外皆同矣。（五月二十五日）

舉辦講學大會，不僅參加武夷書院的秀才們，而且其他周圍書院，即芝峯書院、謹江書院、三山書院等的秀才們也參加。在大會前一天，在徐布政司的參與之下，秀才們按照節次舉行彩排。即先出門外迎接、諸生列立三揖、宗師坐椅、秀才代表三次親獻奉茶、以及朗誦詩歌音樂等後才結束。除此之外，第二天上午還舉行三次練習⁹⁾。可見，這次講學大會是既規模龐大，又非常重要的學術活動。同時可了解徐布政司的學術上地位。

“五月二十五日”記載了講學大會開始的情況，就是貴賓的報到和迎接的程序。諸秀才根據前一天舉行的彩排練習，一一迎接諸位老爺官員：當時參加有察院都御史金學曾、行人司行人李汝奎、左布政使朱運昌、右布政使陳性學，以及按察使、前泉州和前興化知府，與福州、泉州、興化地區的訓導，可知大會盛況場面。此時諸秀才出門外祇迎，從他們的就座程序來看，規則十分認真，不容馬虎。當時魯認在大會之前，接受徐布政司的吩咐，撰寫了數行的奏文¹⁰⁾：

我之奏文，倪秀才呈于布政使曰：“此乃朝鮮官魯某之文。”布政使先受讓于軍門，軍門讓于李行人司。人司三讓而後開讀曰：“他朝鮮人怎麼這邊來？”徐宗師悉陳所由，李行人曰：“他之命，貴得緊貴得緊。”軍門布政盡見曰：“叫他來。”我進于階上，亦如秀才之三揖，則諸相皆三答以後，進坐椅上。而軍門三讓于中堂主壁之椅，則李行人亦三讓以後，坐于主壁上椅。而軍門以下，亦以次序，分坐左右。諸秀才則左右前後，亦皆列坐于獨木長登床，我則隨秀才

9) 五曰二十五日：“諸秀才早整衣冠，又習講學節次。日將午，徐宗師先來坐堂，又習節次者三。”

10) 五曰二十五日：“風寒洙泗，道磬寥寥，明道堂上，更振大鳴。幸屬國愚蒙，願立階庭之下，聞餘響之鏗鏘。伏念僉大老相國，勿拒善變於華者也。”

之末。宗師分付曰：“使朝鮮官，列坐於總角秀才楊森、李俊泰、卞以哲之上。”我承命列坐，凝神聳觀。

接著《錦溪日記》裏詳細地記載了學辦講學大會的盛況云：

秀才五人，趨詣尊所，親奉茶碗，進獻諸相前，單揖而立。諸相起立奉碗，置于案上，答揖以後，坐而飲茶矣，退碗則門子奉進。如是者三次以後，執禮秀才一人，出立前列，高拱高聲曰：“進講案！”秀才二人，置《心經》及《大學》於大案上，兩手對舉，齊眉置于堂中。執禮又出高聲曰：“唱歌詞！”秀才三人，列立東邊，歌詠《關雎》、《鹿鳴》之章。秀才二人，分立東西鍾磬邊，相擊相和，激激切切，清朗錚然。滿堂拱默，氣定神清，自然有蕩滌消瀦底氣像矣。

在這裡主要說明第二個程序，為諸秀才獻茶儀式三次；接著有獻《心經》及《大學》講案；再次由秀才三人歌詠《關雎》、《鹿鳴》之章，同時秀才二人分別打鍾磬；唱完後有“進講”程序：

唱畢，執禮又出高聲曰，進講云，則秀才二人，出立案前，先講經（《大學》）一章，以止脩二字，互相質問。徐宗師儼然擔當，隨問隨答。而次講《心經》，宗師亦纚纚焉，諄諄焉，剖釋秋毫曰……而宗師時向諸相而講論，則諸相皆拱袖唯唯曰：“不敢！不敢！”講將畢，李行人啓口相答，互相質證，討盡所蘊。滿堂悅服，莫不滄飽。如飲江河，各充其量。執禮又出高聲曰，講畢云。則秀才二人，學講案退。

由秀才二人講《大學》一章後，“止脩”二字，互相質問，此時由徐宗師隨問隨答。再次講《心經》後，由徐宗師來詳細地分析。徐宗師的講論即將結束時，由李行人開始互答，互相質證，討盡精深的含義。因此滿堂悅服，各充其量；可見，不僅大會程序，井然有序、有條有理，而且大會風貌真是蔚為壯觀，嚴肅敬重，令人凜然生畏。同時學問討論得盡興，質疑論證，聽眾得到滿足。最後有“既而，僉相前則門子進薦杯盤，只行三盃。而諸秀才前則以長壺列爵，

各行一盃，肴果則冰糖、荔枝、粉糖餅而已。”這些活動似乎與祭祀完畢的宴飲同等，是一種飲福禮。

講學大會裏討論的主要內容為《大學》的“止於至善”與“修身爲本”。大會第二天魯認請教于倪秀才：

早起問于倪秀才：“昨日所講經一章，則庶幾會聽，但未詳濫與，願聞精微。”秀才曰：“修身爲本者，止至善之竅門也。止于至善者，修身爲本之命脉也。魯先生熟讀《全圖答問》，付之梓人，傳頒聯朋講學，則朝鮮人人向學，民皆孝悌忠信，尊其君親其長。此所謂好謀而成者，故天時地利，不如人和。（五月二十六日）

所謂“修身”，爲到達“止至善”的入門；“止于至善”爲“修身爲本”的命脉。“經一章”爲《大學》一篇綱要之所在，朱子尊之爲經文。闡明三綱八目之連貫性，由個人之明明德做起，從格物、致知到平天下，以達止于至善之境。所強調的內容主要是朱子的“修身爲本”與“止于至善”。

在講學大會剛結束時，徐布政司跟行人司行人李汝珪稱讚魯認的詩文，李汝珪乃回答云：“宗師曰：‘他之文與詩極妙。’李行人曰：‘那邊國風好喜詩。’秀才之子做秀才，武弁之子戴武弁，蔭官之子做蔭官，宰列之子做宰列，諫臣之子入臺。一自箕聖之東，文獻之風有素矣。”（五月二十五日）他認爲朝鮮重視詩文的風氣，皆歸于箕子功勞。

此外，講學大會結束後，參加的其他書院的諸秀才向魯認請教朝鮮的風教禮儀。因此從傍晚到深夜，他們討論朝鮮學習制度以及釋奠祭式：“他書院初見秀才輩，欲聞我國禮義風俗。自初昏至子夜，懸燈筆話。答之以自泮宮，以至州縣學校，釋奠祭儀，崇儒重道之教，及冠婚喪祭之禮。則滿堂皆嘆服也。”（五月二十五日）可知，當時明朝諸秀才對朝鮮風土人情關注的程度。

III. 閩地學術思想

在學術思想方面，雖然朝鮮王朝與明朝皆為儒教文化圈的成員，然兩國之間仍存在著學術上的分歧。例如，在明朝社會，除了程朱理學之外，紳士階層中陽明學也頗為流行。尤其是明朝中葉理學的發展，基本上是以王陽明的學術思想為中心，逐漸開展出來。而朝鮮朝廷雖然尊明事大，但是基本上排斥陽明學，朝鮮一貫地固守程朱理學。不僅僅是朝鮮性理學的泰鬥李退溪與李栗穀，“尊明排清”的代表文人宋時烈(1607~1689)也是一生致力於朱子學研究的朝鮮代表性性理學者。朝鮮朝士大夫根據程朱理學，批判明朝的宦官政治與陽明學的思想傾向。

從魯認的記錄來看，十六世紀末閩地的學術氣氛與中原不同。當時被稱為閩地道學第一人者，右布政徐即登激烈批評陽明學，認為它根本不是孔子之學。在五月十八日記錄裏，有對徐即登名聲地位的評價：

坐營亦多賀多賀曰：“此省秀才雖多，得參徐宗師講會者無幾。今足下藐以藩邦一俘餘，特薦參講，不其幸乎。果是徐宗師當今第一道學，直頂孔孟，天下歸宗，巍然落落泰山岩岩。”不佞昨進早衙於大司馬時，司馬曰：“朝鮮官今亦催歸否。”不佞即對曰：“徐爺薦入於兩賢祠。”大司馬亦以為嘉喜。

以上引文是楊坐營與魯認對話的一部分。楊坐營祝賀魯認能夠參與徐宗師講會，因為本國的秀才眾多，但是能參加徐宗師講會者寥寥無幾。從此了解兩點：其一、魯認的學問在當地被認可。其二、徐宗師學術上的地位在當時無人能比。“徐宗師當今第一道學，直頂孔孟，天下歸宗”句中，了解徐宗師的為人和學問。在五月三十日的記錄裏詳細的記載徐即登的學術思想：

徐宗師常痛學術之誤，做出一章正論，以自筆題于木屏風常設於明道堂北壁之下。其文曰：“今天下人人，皆誦法孔子。然問其所以孔子之學，則不知未害也。近有一種學術，聞略於心身間，而以超脫為入微，以融通為妙悟。聽其

言，分明出老入釋，究其學則曰孔子，人亦往往以孔子學目之，此其爲害，蓋不淺也。噫！孔子往矣，其書尚在，可考而證也。《魯論》中所與諸弟子答問，誰非求仁。至稱傳得其宗，非省身克己之顏曾，不與焉，則何以也。

徐即登將陽明學的特徵概括爲“聞略於心身間，而以超脫爲入微，以融通爲妙悟”，其實不過“出老入釋”，與孔子之學無關。但是衆多人誤認爲把它看成孔學，而不得不發出“此其爲害，蓋不淺也”的感嘆。好比雖然孔子之徒有三千，然只有“省身克己”的顏回與曾參繼承了孔學的正統。接著他從“省身克己”四字中發揮對《大學》的觀點云：

及作《大學》以垂世立教曰：‘明明德’，曰：‘親民’，而必曰：‘止至善’。乃所列明親之目，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井然分矣。而復結之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曰本在此，止在此，又何其約而盡也。由斯以談，吾身聯屬乎家國天下，步步莫非實際，豈不廣大。吾身完具此心意知物，種種皆是眞修，豈不精微。然實實落落，不求之家，不求之國，不求之天下。而全副精神，直歸向裡，吾正吾心，吾誠吾意，吾致吾知，吾格吾物，一毫熒惑，不及其他人。豈不易簡。此孔子盡性之學也。知此者，謂之知本上此者謂之止善，識此者謂之識仁，而異乎此者，謂異端。有志之士，吾願其共明此學。”

程朱理學歷來非常重視《大學》。如二程分撰“大學改本”，是歷來《大學》改本之祖，至朱子崛起於南國，撰《大學集解》、《章句》、《或問》，集北宋諸儒之大成。朱熹《大學章句》乃據程子之意，將闡明三綱八目之篇分爲經一章，傳十章。徐即登根據于朱熹的《大學綱要》，加上繼承了他的老師李材主張¹¹⁾，有所發揮。由個人之明明德做起，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11) “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老虛玄之學。故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歸宿也。家此齊焉，國此治焉，天下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爲而治者，用此道也。”(《知

身，發揮到親民、齊家、治國、平天下，以達至於至善之境。又援用《大學》句子，強調從天子至庶人，一定要“皆以修身爲本”，表現了求學先要修心養性的道理。因此說“全副精神，直歸向裡，吾正吾心，吾誠吾意，吾致吾知，吾格吾物，一毫熒惑，不及其他人”的境地，這就是“盡性之學”，了解“盡性之學”，謂之“知本”，止于“盡性之學”，謂之“止善”；認識“盡性之學”，謂之“識仁”；而不同于“盡性之學”，皆爲“異端”¹²⁾。此外，在明道堂的西壁和東壁下，各有文章：

又西壁之下，亦設小屏風。其文曰：“以嗜慾殺身，以虐政殺民，以貨財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可有此罪過。”又東壁之下，亦設小屏風。其文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功業。”蓋此文，排斥陸象山王陽明學術之誤，而倡明孔曾傳受經一章蘊奧之旨。與見羅李先生，倡和一世，天下歸宗焉。

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指的是陽明學；同時批評陽明學無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功業。可見，徐宗師倡明程朱之學，排斥陸王之學之苦心。從“與見羅李先生，倡和一世，天下歸宗焉”三句中，不僅了解當時徐即登學術上地位，同時亦認識閩南地區學術思潮。在朝鮮方面也不難找到有關徐即登的記錄。如朝鮮中期著名的性理學者尹根壽有對他學術的評價：

臣又聞卽今江西人徐卽登，翰林出身，而提學于福建。講學武夷山紫陽書院，力排陸九淵主陽明異端之學，名振中外。凡於福建，浙江學宮屏風，卽口輒以大字書王守仁之過失曰，以虐政殺民，以寶貨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可有此過口。”¹³⁾

本義》)黃宗羲《明儒學案·止修學案》卷三十一。

12) 除了程朱理學的系統之外，都是“異端”的主張，表露出程朱理學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13) 《月汀先生集·文廟從祀議》卷之四。

又在《記徐即登排陸學語》云：“廣東軍門李材字孟誠，號見羅先生。江西豫章人，力排陸學。同里閔徐即登以門人，唱和同力，共排陸學。見羅為時人所忌，遠謫漳州。徐即登以翰林出身，在北京從宦，痛其師非罪遠謫，自願為福建文提督。瓜滿又陞其省兵備道，又陞布政司分守道。”¹⁴尹根壽高度讚揚徐即登的人品與學術。他不僅為了他的老師自願當地方官，而且力排陸九淵主陽明異端之學，而名振中外。同時他尖銳地批評陽明學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的異端邪說。雖然閩地學術繼承了程朱理學，但在風俗上并不完全遵照《朱子家禮》。這就是朝鮮與明朝禮俗之最大不同之處。比如，六月十九日魯認跟著諸秀才去參觀當地的儒家喪禮說：

我隨到其家，則喪者穿齊衰腰首經，持竹杖履芒鞋，立於堂中喪柩前痛哭，而諸秀才亦列立對哭而不拜。蓋喪柩則用漆極美，而置于北壁下。又立影像於柩前，而西邊立丹旌，東邊設枕席衾褥。又以白紗帳□于四面，朝夕掃柩。蓋此喪禮，純用晦庵家禮。但銘旌則書之曰：‘顯考行年七十三歲李公之柩。’比則大不同也。俄而，諸秀才辭歸。則喪人曰，勸挽留，薦茶而薦飯。喪者亦以蔬菜對飯，此亦非晦庵之禮。秀才□□回來，即做科業文章七篇，其為勤做工夫如是矣。

魯認認為這些喪禮，基本上追隨著《朱晦庵家禮》。然在銘旌的寫法有異，同時喪主與客人一起用餐，亦為違禮的。對此，至隔日(六月二十日)他就去找秀才們討論這天儒家喪禮：

臨夕，就倪秀才房曰：“昨日喪家之禮，與晦庵家禮彷彿而相異。銘旌大不同，初喪與客對飯，又大違禮矣。”諸等曰：“大江之南，則或純用而或不同，江北則純不用之，蓋陸學亂之矣。”(六月二十日)

根據魯認介紹，朝鮮一一遵照《朱子家禮》，進行喪禮。但是明朝在長江以北不用《朱子家禮》；在長江以南，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還依照《朱

14) 《月汀先生別集·記徐即登排陸學語》卷之四。

子家禮》進行喪禮。可見，隨著閩地與其他地區學術上的不同，而導致風俗上差異之處。在五月十三日的記錄裏亦有相同的觀點：“諸秀才相顧始曰：‘信貴國文獻，天下盡知。然守法知禮，豈意此極。晦庵家禮，中國雖不盡用，而大江之南，則用之者頗多。貴國則至於奴賤皆用云，蓋箕子之遺教也。’”可知，當時明朝陽明學的影響非常廣泛，但是閩地還比較重視朱子。四月六日到興化府北門時，魯認看到“文公生祠堂”匾額，就進去四拜而出：

早起馳向興化府，行至北門之內，道傍有鬼然□□□題額，乃朱文公生祠堂，即駐馬問于市人。答曰：“□□□□時所建生祀堂”。我又問曰：此何縣耶？曰：“此乃東安縣也。□□弘仁愈久不忘，永慕敬祭，迨今如昨。”又問曰：“祭于何時？”答曰：“蟄驚霜降矣”我即下馬入庭，四拜而出。左右曰：“爾那裏人耶？”答曰：“我本朝鮮人也，我國凡禮，一遵朱晦庵家禮。”左右歎之曰：“爾幹何事而來耶？”林差官略陳我來歷，左右尤嘆。

當地爲了朱子“弘仁愈久不忘，永慕敬祭”，至今仍然到驚蟄和霜降，恭敬祭祀他。既然如此，當地學術思想亦以程朱理學爲主。在徐布正使之安排之下，魯認到兩賢祠書院，經常請教于當地學問。如在五月十四日魯認在兩賢祠書院的館所參講時，向秀才請教徐宗師的道學：

早朝進拜倪秀才房，書示曰“不佞叨陪僉賢已數日。願聞匡嶽徐宗師倡明道學之的。”倪秀才曰：“吾儒只宗孔聖，而孔聖之學，只在《大學》經一章。蓋大學之道，論主意則只是止於至善，論工夫則却是教以修身爲本。止於至善者，修身爲本之命脉也，修身爲本者，止於至善之竅門也。

徐宗師道學的根本在於《大學》的“止於至善”與“以修身爲本”。又在五月二十三日的記錄：

早去謝秀才房中，請學《心經》。則答曰：“心經只究人心道心之分，而經之主意，則只是一箇敬字。蓋敬者，‘主一無適’，而常惺惺法，無一物不得容

其中。故聖賢徹上徹下之功，都在敬而已。若不以敬操之爲心上之功，則紛華波動，發如奔霆，莫知其鄉矣。足下曾在本國，既與師友，講明有素，則《心經》不須吾講而明矣。且吾道一以貫之，則蓋一者，乃精一之一字，只分人與道之間，以敬操之而已矣。”

所謂“主一無適”是程朱理學的“修養說”。首先程伊川提起，後來朱熹繼承他的觀點，主張釋‘敬’爲‘主一無適’之謂。所謂‘無適’實是‘無敵’之謂，‘無適’乃‘無敵對’的意義，所以說是‘主一’。即精神高度集中于“敬”，而心不能放在“外物”。吾道一以貫之，唯一以敬操之。又在六月三日的記錄：

早起請益於倪先生，則先生曰：“足下識見高明，景慕晦庵，庶免泣歧之歎。然止脩之學，今始醫聾。必沈潛細究，惺惺於戒謹操檢然後，八條之功，自有歸宿之所。而腔子常活活於人性之綱，施之萬事，無處不活。此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吾儒經濟之功，亦在於此。惟足下自省焉。

在此強調“止修之學”。所謂“止修之學”，指的是《大學》的“止於至善”與“修身爲本”。所謂“八條”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當地的學術主要重視以《大學》“止於至善”與“修身爲本”爲主的程朱理學。因此朝鮮中世紀著名學者柳成龍《文集》裏也有關於閩地學術的記錄：

有魯認者，被虜入日本。久不得返，遇中原浙江人某，因與相熟。其人愍認心事，謀脫回百計，遂自日本逃至福建。認頗解文識字，處處聞朝鮮士子從日本逃來，待之甚勤。引與遊觀諸處，遷迤入武夷山，第五曲有朱子書院。院中學徒數百餘，院長每日率諸生，講學行禮，學規甚嚴。晨起擊鐘，諸生分庭相揖，歌關雎三章，登堂聽講，日晚酒罷。夕又相揖，歌鶴鳴，日以爲常。令認同參講席幾數月，臨別，諸生各爲歌詩以贈之。且云聞朝鮮以爲中原尙陸子，實不然。陸學間有尙者，如此處，專崇晦庵之學，須以所見歸語朝鮮云¹⁵⁾。

15) 《雜著·魯認》，《西厓先生文集》卷十六。

柳成龍通過魯認的認知，記錄了武夷山書院的規矩，院中學徒所過的生活。儒學經過宋代的興揚之後，朱子學得到重視，明朝陸王心學開始崛起，蔚然成風。當時朝鮮以為中原崇尚陽明學，但是實際情況不同。明朝仍然還有專崇晦庵之學，這是朝鮮學者所沒有想到的事情。

IV. 科學文化與社會制度

根據《錦溪日記》記述，魯認從五月十二日開始，到離開福州之前，兩個多月住在兩賢祠。在這段時間他與諸秀才探討的問題非常廣泛，通過他們之間的對話，不僅可以了解當時明朝與朝鮮科學制度的特點，而且明朝的稅法制度和軍隊編制的大略情況等，記載的內容極為豐富。

如在六月一日，謝兆申、倪士和秀才，以下諸秀才，皆會於明道堂，想瞭解朝鮮科制。魯認回答：“式年初試則鄉舉，會試則咸聚京師。而生進各取一百，文科及第則取三十三名，武科則取二十八名矣。”(六月一日)

至於具體考試的方法，魯認說明了生員和進士的錄取方法，亦說明文科及第初試以及會試的錄取方法。初試要通過論、策、賦、表、頌文考試；會試針對《四書》、《三經》的能誦背講通過後，再到王宮考論、策、賦、表、頌文，其中高的成績入格者，按照成績次序發榜。所以文科及第，至少需要經過三次考試。武科初試需要經過四個程序：先試以三百斤勁遠射，再試騎射，五發五中。其次試八錢木箭遠射，再試騎槍，三發三中。再次試馬上擊毬，最後考理論，即試《四書》中一書及《武經七書》，能通者取。會試的錄取方法與初試同等¹⁶⁾。

16) 六月一日：“生員則專以《四書》出題，進士詩、賦，俱篇入格者取之。而會試則先講《小學》、《家禮》，能通然後，次入場中，又中謂之進士。而文科及第初試則論、策、賦、表、頌，俱入格者取之。會試則先講《四書》、《三經》，能誦背講然後，又入闕庭，論策、賦、表、頌，亦高中入格者，以次出榜，謂之文科及第。而武科初試則先試以三百斤勁，能彎遠射六兩鐵箭於二百步然後，次試騎射，五發五中。次試八錢木箭遠射於五百步然後，次試騎槍，三發三中。次試馬上擊

諸秀才認為朝鮮文武科，更難於中國。所以他們提問對《四書》、《三經》，背講節次方法。對此，魯認非常詳細地說明了朝鮮科舉時，背講經典的節次與方法¹⁷⁾。他們打聽之後，大驚曰：“中國雖專治經術，只入場中，能製文章七篇(文章乃《四書》、《三經》中，出題之作，稱曰文章)而已。本無‘七書’背講之規。貴國背講之規，更難於能製七篇。貴國文獻之稱，信非誣也。”¹⁸⁾由此了解，朝鮮較重視經典原文的理解；然明朝重視經典的應用與援用。

到了第二天他們繼續討論明朝科舉制度。魯認提問有關“鄉貢文武科舉制”，秀才詳細地回答云：

式年則各其知縣，以《四書》并出四題，試之於白日場，入格者入送於知府。知府又以《四書》出題，俱入格者謂之童生。知府并會屬縣童生，以《四書》一經，各出五題，俱入格者謂之生員(生員謂之秀才)。軍門又大會生員，試之三場。初場則文章七篇，中場則策文五度，終場則論賦、啓、頌、判五度。通三場并十七篇，皆限白日，俱入格者，謂之舉人，各省出榜，轉送于京師。會試三場，亦如初試三場之規，俱入格者，謂之進士，其數二百。而武科則各其省，只以武材取之，謂之武科。武進士則與舉人并會京師，安邊策三章，能製於燭刻，俱入格者，謂武進士，其數一百。蓋武進士非徒燭刻，其數倍減，更貴於文進士矣。(六月二日)

毬，能制能中然後，次講《四書》中一書及《武經七書》，能通者取之。而會試亦如初試，入格之規同也。秀才等皆嘆：“貴國文武科，更難於中國矣。”

- 17) 答曰。吏部尚書精擇明經。忠直宰列十餘員備望入闕。則主上落點。差出七員。而禮曹命卜擇日然後。試官坐于公廡。令寫字官。四書三經大文。皆書於三寸竹簡。分其秩數。各納于大筒中。置於上試官案上。而以鹿皮爲帳。遮隔內外然後。烏臺御史二員。戴獬豸冠。分坐帳外左右。以察循私之弊。而招入舉人。使坐兩御史間。上試官以手拈出筒中簡書大文。移寫于講紙。以帳下出許舉人。則舉人奉展讀盡音釋然後。章頭章下篇題大註及雲峰雙峰大宋諸家輯註。盡數背講。純通然後。謂之明經科。而武學講經之規。亦如是。
- 18) 當時明朝不實行“講經”制度，而實行“製文章七篇”的“明經”制度。但是對“明經”制度，他們極爲不滿，如云：“我問曰：‘講經則何不爲之?’秀才曰：‘文章七篇，能做入格，已謂之明經，何更講爲此規。此制乃王安石作俑之制，至今科士，苦而怨之。’”(六月二日)

在明朝到進士及第，一共考五次考試：首次在知縣考；二次在知府考試，被考上人叫童生；三次在知府再考《四書》，被考上的人叫生員；四次在軍門生員之間考試十七篇創作，被考上的人叫舉人；最後到京城考試，被考上的人叫進士。武進士考“安邊策三章”，最後考上的武進士，只有一百人。此外，他們又討論了科考上防止作弊的問題和措施。明朝與朝鮮都禁止持書入場。萬一帶書被發現，不得入場。對此，在朝鮮有如下的措施：

入門時錄名官、搜挾官，坐于兩邊，使禁亂軍士，列入左右，搜得舉子身上。如現出冊子，則即掛榜停舉，而冊子則即付丙丁。故細書至密，或入靴中。或入于衣襟矣，未知天朝，亦無此等事乎。秀才曰：“我國亦或有之，其為重科之情，天下同然，左右拍手大笑。(六月二日)

可見，當時朝鮮與明朝科考時，為了嚴格禁止作弊。不僅入門時搜舉子身，萬一被發現，則治以重罪。至於中國科考，如有違規，秀才有回答云：

秀才曰：“場屋間數，一依舉子多少，而各區別一間。場中軍士數，亦如舉子數。每一間又舉子一名，使軍士一名，各守之，使不得相通借述。如有現露借述，則雖軍門布政子弟，即繫三百斤枷，而露立場中，棍打一百板，則立死而曳出。蓋科法之嚴，甚於闕庭。未知貴國亦如是乎？”答曰：“我國一從大明律，故現露則決杖一百流三千里矣。”(六月二日)

考試監督非常嚴格。明朝考試監督的軍士數與考生數為同樣。如果被發現作弊，“雖軍門布政子弟，即繫三百斤枷，而露立場中，棍打一百板，則立死而曳出。”朝鮮也根據《大明律》以“棍打一百板，流三千里”的重罪來，問罪作弊的考生。關於明朝的稅法制度，首先說明國稅的種類，如六月十一、十二、十三日：

我問謝秀才曰：“願聞中國稅法也。”秀才曰：“自古稅法多變，而至唐用租、庸、調三法，而迨尙因用。蓋租者田稅，庸者身役之價，調者烟家雜役之

價也。夫稅者，非獨謂田稅也，市井稅、魚鹽稅、商賈稅、宰殺稅。隨處隨稅，各有程式。而庸稅則朝官、秀才、儒生及官軍、山僧外，一家雖有十人，老弱則除之，每年各收銀子一錢五分，調稅則口閑丁，亦收銀一錢五分。”

基本上繼承唐朝的租、庸、調三法。在租稅方面，除田稅之外，還有市井稅、魚鹽稅、商賈稅、宰殺稅等，各個地方皆有稅，有一定的收稅方式；在庸稅方面，朝官、秀才、儒生及官軍、山僧以及每個家庭，除了老弱之外，每個人皆繳“銀子一錢五分”；調稅方面，沒有職業的閑丁，亦要繳“銀一錢五分”¹⁹⁾。有關收稅的用處：

凡干各稅，布政司管。都收合後，分爲四分：而一分則輸運兩京，爲奉祭祀祿百官。一分則爲各省、各營兵食。一分則爲各路、各驛往來差官及送舊迎新、應赴舉人夫馬之價。一分則爲自軍門總兵、布政、按察、監察、兵備道、分守道、巡海道(巡海道乃巡陞兵鎮御史也)、屯鹽道、都指揮使、參將、遊擊、海防官，以至州、府、郡、縣地方官，各衙官員月捧及小小下人、書字、門子、舍人、廚子、健步(健步乃使令也)、房子之食。(六月十一、十二、十三日)

可見，收稅由布政司來管轄，收稅后，分爲四：一分則輸運兩京，一分爲各省、各營兵食所用，一分爲各路、各驛所用，最後一分則爲自軍門總兵到州、府、郡、縣地方官，各衙官員月捧及小小下人的伙食費。關於軍隊編制之說明如下：

又去謝秀才房問曰：“兩京及十三省留養之兵，幾許也？”答曰：“不知其幾萬，大槩兩京軍，則四百衛。而一衛之軍，每五百名，都數二十萬。其餘十三

19) 此外，一年春秋兩次收稅：“三千三百八萬五千九百石內，漕運米四百萬石，絹二十萬五千五百匹，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斤，綿布十三萬八百匹，麻布二千七十四，南蠻席布二千五百十六條，菜六十五斤，針八萬一千縫，馬草一千四百六十九萬五千句，馬驢騾三十萬九千匹，鹽共四萬六千六百石矣。”(六月十一、十二、十三日)

省軍，則無慮五百餘萬衆。而每一名，每月各受銀一兩。而公、候、伯、子、卿大夫，州、府、郡、縣月捧之銀，不知其巨萬。中國物力殷富，通萬古比來極盛矣。(六月十四日)

通過謝秀才的說明，在兩京有二十萬兵馬；其餘十三省軍隊，有五百餘萬衆。此外，他們每個月收銀一兩的薪水。

V. 結 論

研讀魯認《錦溪日記》，可以做出如下結論：

首先，閩地學術文化是明代中國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雖然朝鮮王朝與明朝皆為儒教文化圈的成員，然兩國之間仍存在著學術上的分歧。例如，明、清社會除了程朱理學之外，紳士階層中陽明學也頗為流行。尤其是明朝中葉理學的發展，基本上是以王陽明的學術思想為中心，逐漸開展出來。但從魯認的記錄來看，十六世紀末閩地的學術氣氛與中原不同。當時被稱為閩地道學第一人者，右布政徐卽登激烈的批評陽明學，極力維護閩學宗旨(講程朱，斥陸王)，而聞名中外。透過《錦溪日記》，我們看到了閩地宗教思想，對儒、佛、道三家文化的追求與瞭解世界的欲望成為閩人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也是閩人取得成功的一個至勝法寶。這些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在明代閩地就已經成為慣習，通過魯認的講解，閩文化與朝鮮文化的不同點也被發掘出來。

其次，魯認的日記具體描繪了明代閩地文化人的讀書生活和精神世界。徐布政非常讚賞魯認的文才，嘉嘆而將他安排住兩賢祠，參講留館。因此他從五月十二日到離開福建的七月十四日，一共兩個多月的時間住於“兩賢祠書院(武夷書院)”。這對魯認來說了解閩學特色之好機會。如書院的建築結構、亦有記載書院院規以及每個月初一與十五日，兩次舉行的大型參講活動。此外，他通過與閩地士大夫探討和學術交流，了解當地士大夫的朝鮮觀。從此加深當地學風的難得機會。《錦溪日記》雖然只是一本忠實地記錄筆者體驗的閩

地生活，但是透過這本日記，我們看到了真真實實的，特別是閩地書院學術活動。魯認描繪了一個完整的明代閩地書院講學大會：如迎接、獻茶、獻講案、歌詠打鐘、進講、互相質證討論、飲福禮等大會的程序，也了解大會儀式與討論的內容、場面的盛況等。讓我們重新回到了已經幾百年前的閩人學術活動之中，對他們的學術文化有了更深的感受。

第三，《錦溪日記》生動展現了朝鮮後期兩國人士的相互認知和友情。魯認住在兩賢祠的短短的幾個月生活，魯認和武夷書院的諸秀才們結下了深厚的友情，與諸秀才探討的問題非常廣泛，通過他們之間的對話，不僅可以了解當時明朝與朝鮮科舉制度的特點、明朝的稅法制度和軍隊編制的大略情況等。根據《錦溪先生文集》記載，神宗皇帝對魯認的評價很高，六月二十六日，軍門以公疏本轉達皇帝的詔書：“皇帝特下忠如祥，節如武之詔。”這是說他的忠誠如文天祥，氣節操守如蘇武，是對他的肯定與褒揚。七月十六日，朝廷同意魯認回國，又“皇上命下兵部賜禦馬一匹，使員外史汝梅護送”。軍門都督以夫馬護送他到北京。離開福州“各衙諸相一院生徒，作序贈詩，又以閩學宗旨（講程朱，斥陸王）”²⁰相共勉。武夷書院的倪士和與謝兆申等十餘人到山海關為他餞行，飲酒贈詩，別懷無窮。

總之，記載的內容極為豐富，這是《錦溪日記》的一大功勞。據此，我們直接回到了五百年前的閩文化的環境之中，具體了解十六世紀末明朝閩地的風俗制度，以及明代士大夫的朝鮮觀等。《錦溪日記》值得進一步研讀和探討。

<參考文獻>

黃宗羲，《明儒學案》(上，下)，中華書局，1985。

魯認，《錦溪先生文集》，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7。

朴永煥，〈魯認《錦溪日記》裏的詩歌研究〉，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編，《紀念

20) 魯認, 앞의 책, 125頁。

中韓建交20周年‘中國江南與韓國：交流與友好的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6.

魯認, 《錦溪日記》, 조선고서간행회편, 민족문화추진회역 9, 《(국역)해행총재》,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86.

姜在彦, 《선비의 나라, 한국유학 2000년》, 한길사, 2003.

魯認著, 노기욱 역, 《임진 의병장 노인의 금계집 국역본》, 전남대학교출판부, 2008.

<國文提要>

魯認(1566~1622)의 字는 公識, 號는 錦溪로 전라도 나주시 하의리 사람이다. 선조 때 진사급제후 임진왜란이 일어나자, 권율장군 휘하로 들어가 수차례 공을 세운다. 하지만 1597년 6월 전라도 남원전투에서 일본군에게 포로로 잡혀 일본으로 끌려가, 시마즈 요시히로 아래에서 18개월 동안 포로생활을 한다. 후일 중국북건성의 관리인 임진혁 등의 도움을 얻어 1599년 3월 17일 일본에서 탈출에 성공하여 11일 후 중국 福建省 浯縣에 도착한다. 북건성 정부의 안배로 장주와 흥화를 거쳐 복주에서 3개월여 생활을 하다 명나라 만력황제의 허가를 얻어서 1599년 12월 조선으로 돌아온다. 포로생활부터 귀국에 이르기까지 魯認은 거의 매일 일기를 작성하였는데, 현존하는 일기는 1599년 2월 22일부터 동년 6월 27일까지 약 4개월여의 기간을 기록하고 있다.

이 일기는 당시 북건성의 풍속습관과 사회문화 및 학술사상에 대해 상세하게 기록하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장강 이남의 風教와 禮制, 과거제도 등에 관해서도 상세히 언급하고 있어 16세기 말엽의 북건성 문화를 이해하는 데 매우 중요한 사료적인 역할을 하고 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국내 학계에서는 거의 주목을 받지 못하고, 단지 임진문학의 측면에서만 단편적으로 언급하고 있을 뿐이다. 본 논문에서는 <금계일기>에 수록된 당시 武

夷書院의 상황과 서원에서 개최한 “講學大會”의 특징과 내용, 당시 명나라의 과거제도 실행상황 및 그것이 조선과 어떤 차이점이 있는지 여부 등, 당시 학술사상과 서원문화에 대해 집중적으로 소개하고자 한다. 이를 통해서 《錦溪日記》의 학술사료적인 가치에 대해 집중적으로 조명하였다. 만약 15세기 말엽 명나라의 절강성과 강소성을 중심으로 하는 대운하 주변의 지역문화를 집중적으로 소개한 것이 최부의 《漂海錄》이라고 한다면, 한 세기 후에 나타난 《錦溪日記》는 16세기 말엽의 복건성의 학술과 정치, 윤리문화, 예제와 풍속 등에 관한 풍부한 기록으로 당시 복건성의 면모뿐만 아니라 명나라의 문물제도를 살펴볼 수 있는 매우 중요한 사료라고 할 수 있다.

주제어 : 魯認, 錦溪日記, 兩賢祠書院, 學術思想, 講學大會, 科舉制度